

·批校题跋研究·

明抄本《储王合集》手批作者考*

——兼论竟陵派评点特色

冯小禄 张 欢

内容摘要:据明抄本《储王合集》所留下的大量手书题跋、评点文字和多枚名章、官印,可考证出此手批作者乃是明末清初的成都人朱之臣。与《唐诗归》相比较,可看出朱之臣手批具有十分鲜明的竟陵派评点特色,是竟陵派评点的又一范本。在现存钟惺、谭元春文集中,有多篇文字可以证明朱之臣与钟惺、谭元春有深入密切的交往,十分熟悉《唐诗归》,故能在评点储光羲、王昌龄诗时,与之交相呼应。

关键词:《储王合集》 朱之臣 《唐诗归》 竟陵派

云南师范大学图书馆(原昆明师范学院图书馆)古籍特藏室在1949年前入藏有一套名为《明人手批储王合集》(以下简称“《储王合集》”)的楷书精抄线装本。一匣四册,不分卷,蓝格。前二册抄录唐代著名诗人王昌龄诗148题、172首(含失题残句2首),后二册抄录储光羲诗158题、230首。整套书印篆累累,朱墨灿然,留有手批作者的大量朱墨笔圈点、行书评跋文字和印章。该抄本曾为清代道光年间山东文登于氏兄弟(昌进、昌遂)等藏书家收藏,钤有多枚藏书印。由于深藏馆中,学界罕见介绍和研究。唯国家图书馆网站据学校馆藏古籍书目,著录为“储王合集不分卷,明万历四十七年抄本,八行十九字,白口,四周单边”,藏点为“昆明师范学院图书馆”;金生奎《明代唐诗选本研究》著录为:“《储王合集》不分卷。编者不详。储光羲诗、王昌龄诗。今存明万历四十七年抄本,藏云南师大图书馆。”^①皆未指出该抄本手批者的姓名。有鉴于此,本文先根据抄本所留下的大量题跋、评点文字,以及所钤的数十枚有关姓氏、字号的名章和所任重要官职的官印,考证出他就是明末清初与竟陵派领袖钟惺、谭元春有密切交往的朱之臣。其次,将朱之臣对储、王诗所作的评跋与

* 本文系2013年度教育部一般项目“明人文集中的东南亚各国资料辑录及文学交往研究”(项目编号:13YJA751012)阶段性成果。

①金生奎:《明代唐诗选本研究》,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78页。

钟惺、谭元春所编的《唐诗归》比较,揭示其评点的竟陵派诗学特色。最后,主要从钟惺、谭元春的文集(朱之臣的《梅龙集》现已亡佚)来考察钟、谭、朱交往的亲密性,证明朱之臣十分熟悉《唐诗归》,于是才可以在评点储、王诗时,与之桴鼓相应。

一、手批作者为朱之臣考

该抄本书匣竖行题“储王合集”,下注“明钞本明宗室遗民手批”双行十小字(下钤四字朱印一枚,模糊难辨),第一册第九页乃棕色硬皮纸,却用隶书竖行题为“明人手批储王合集”八字,都没有指出此“明人”和“明宗室遗民”的姓名。对此,抄本中所留下的大量题跋和印章信息,却可以让我们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考证出手批者的姓名、字号和生平行实。

总观这些手书题跋(往往周边钤有名章和官印),可以发现仅有一则是出于收藏者兼整理者之手(署名“晤庄居士”,无印章),其他十一则均属手批者所为。而且,这十一则题跋具有连贯的时间性,清楚地表明了本书的抄录时间、评点始末、诗学观点和手批者朱之臣在明末清初的出处仕履及鼎革心态。由于其重要性,现谨按时间顺序,加上序号,一一录下,并在后用括号注明本则题跋周边所钤名章、官印和抄本所在的册页位置。

1.王昌龄诗,格高而韵胜,其胜处在幽。储光羲诗,境淡而情深,其深处在朴。二公高处,非王、孟所能及,直与陶靖节争衡于毫厘间耳。己未花朝,繁川居士。(左旁钤“无易”白方和“观书亭”朱方二印,在第一册“王昌龄诗”前数页)

2.万历己未九月初五日,游西山,坐来青亭,朗吟“静言念终始,要坐看沉浮”之句。又游碧云,望皇城金碧,一方烟雾,乃知少伯“佳气盘未央,圣人在凝碧”,如在目也。是日晚归都门,明旦且之鹿泉任矣。此清事,后期何在?灯下书。(旁钤“远士庵居”白方。又有“文登于氏小漠觞馆藏本”白文长方和“东海西山/于氏课虚/昭寂斋主/人真赏印”朱方二藏书印。在第四册录完“储光羲诗”之后数页)

3.往定州谒台回,尘垢满面,急呼水颊尽。在东轩柏影下,取此卷快读数首,尚闻墙外射鼓马蹄之声,如不能静。何时携至青城山上清宫,煮河坪新茗漱齿,尽读为佳也?庚申岁三月三日鹿泉署中,菊水老人书。(下钤“菊水居士”白方)

4.天启甲子三月廿日,游青城山上清宫,携得此卷。正开帙欲读,追偿前约,适灌令陈公置酌建福宫,迫余以往,匆匆辍吟,怅然久之。乃知此清事,山中人且未易得,何暇求尘俗之内哉!归来补书,以志余愧。是月廿五日观书亭。(下钤“无易氏”、“家住成都万里桥”两白方印。本则与第三则均在第二次之后二页的同一页上)

5.庚午余赴贵阳,以谓僻远鲜务,或可读书,仍携此卷筒中。比至,则署

粮、署监军、署臬驿、署学政，复署藩，匆匆未暇也。量移江右，闻报束装，而此卷存笥中如故，甚可愧。乃钤道印藏之。辛未二月。（中间有“贵阳贵宁道关防”，即贵州布政使司右参政、分守贵宁道朱方官印，仅“贵宁”二字可辨。在第一则题跋之前页）

6.崇祯辛未八月，余赴江右，仍携此行。在舟久，颇读之。未任，复移岭南观察。以是年闰月受事。事既殊简，有轩有竹，日朗吟数章，牙齿泠泠，有山泽气。官下复能诵读，而青城山上清官，不能览一字，事真不可定也。壬申上元日，此君轩题。（旁钤岭南臬司，即“广东按察使司分巡岭南道”十字朱方官印，仅“广东”二字可辨。在第一则题跋之后页）

7.余以己亥四月三日任江西藩事，五月五日晒书，印此，未读也，笔以志愧。崇祯八年菊翁。（下钤“梅龙翁印”白方）

8.甲申清明日，金陵寓楼，饼中桃花盛开，此卷适在案头，取寺印印之。烹新茗，朗吟集中警句，见余冰署清福如此。（下钤“青城山樵”白方。本则与第七则同在第二则之前一页，即录完储光羲诗后的第一页。页中钤上下两枚官印，上为“江右藩司”即江西右布政使十字白方官印，下为“南京鸿胪寺印”白方，两则文字分居左右）

9.金陵奉常署中，竹影参差，比之此君轩，景色更胜也。甲申中秋日。（下钤“西州遗民”白文长方。本则与第六则同页，为补题，在“岭南臬司”官印下钤“南京太常寺印”朱方）

10.此卷中有贵宁道关防及岭南臬司、江右藩司、南鸿胪、南太常四印，又有太鸿胪、太常、少司寇诸图书。戊子长至日，阅之不胜沧桑之感，故改以“无所可用”并“眉山老布衣”之章而藏之。（下又钤“西州遗民”白文长方。本则与第五则同页，亦为补题，在“贵阳贵宁道关防”朱方官印左侧。查验“无所可用”白方，在第一册“王昌龄诗”下、“左司马印”白方上；“眉山老布衣”朱方，在第四册最末《寄孙山诗》旁、“少司寇印”、“观书亭”两白方下）

11.大明万历四十八年己未，余任楚屯盐道，命侍书录王江宁、储鲁国诗二册。次年庚申，泰昌元年，余镇井陘，携此行笥中。天启元年辛酉，谒告家居。至崇祯三年庚午，小草贵阳贵宁道。五年壬申，量移江右宁州道，未任，调岭南观察。七年甲戌，转该省右辖。八年乙亥，任江右左辖。十二年己卯，在关中镇庄浪道，远留此册金陵书屋。十六年癸未，晋南鸿胪南太常。是年先帝晏驾，次为洪光先帝元年。甲申正月，迁刑部右侍郎；四月，转兵部左侍郎。此卷适在目前，故前后评点、题跋略有深意。自后沧桑感涕，不复提笔著语云。西州遗民八十五翁书于白下西园隐居。岁己亥，日中元。（有“西州遗民”、“西州遗民/朱子”两白文长方和“青城山还阳子”白方。又有“文登于氏小漠觞馆藏本”白文长方藏章。在第一册卷首，“明人手批储王合集”封面后二页）（图见封二）

值得指出,这最后一次题跋开篇的“大明万历四十八年己未”,据第一、二次题跋,“四十八年”当为“四十七年”的笔误。以上这十一次题跋,实际已构成了一个相当完整的记述和评说话语系统:第一则相当于序,对储、王诗做了一总体的风格评价和诗史定位,最后一则相当于跋,概述了手批作者在明末清初相当详细的仕履出处,表明了“沧桑感涕”的特殊时代情怀,而中间的九次题跋,则清晰地展示了手批作者历次批阅时的仕宦情形和精神旨趣。如此,这十一次题跋不仅具有重要的文学和诗学研究价值,而且可以成为考证手批作者姓名和生平的重要材料。

另外,抄本在录“王昌龄诗”之前页还有一则署名“晤庄居士”的两页题识文字,对第十一则题跋的履历记录有所考辨:

此书前后评跋,颇见手意,且印篆累累,朱墨灿然,独不著姓氏。乃以其首帙履历考之,并西州遗民之章,其人约略可知矣。第有不可解者。其言十六年癸未晋太常,是年先帝晏驾。而思宗殉国在甲申三月,夫谁不知?此讹为癸未,绝不可解。再次为弘光元年,似直指甲申矣。而福王虽以五月至南京践位,沿以明年为元年,是弘光改元在乙酉,此又误为甲申,亦不可解也。书此以俟核云。重九后一日,晤庄居士。

晤庄居士虽说“乃以其首帙履历(按:指第十一次题跋)考之,并西州遗民之章,其人约略可知矣”,但仍未明确指出手批作者的姓名,其重点放在了崇祯和南明年号的干支考辨上。

总计上述题跋和全书其他各处所署与手批作者真实姓名、字号相关的署名和名章、闲章,有:“西州遗民”名章凡两见,“西州遗民朱子”名章一见,“西州遗民”署名一见;“青城山樵”名章凡四见,“青城山还阳子”名章一见;“家住成都万里桥”闲章四见;“眉山老布衣”名章两见;“无易”名章两见,“无易氏”名章一见;“菊水居士”名章一见,“菊水老人”署名一见,“菊翁”署名一见;“梅龙幽居”印章两见,“梅龙翁印”名章一见,“梅龙庵记”印章一见;“观书亭”印章三见;“繁川居士”署名一见;“远庵居士”名章一见;“老人邨中山民”闲章一见;“无所可用”闲章两见。而官印则有:“贵阳贵宁道关防”、“江右藩司印”、“岭南臬司”(以上印文模糊)、“南京太常寺印”、“南京鸿胪寺印”、“大鸿胪”、“太常寺印”、“左司马印”、“少司寇印”各一方。这与第十次题跋所言之“此卷中有贵宁道关防及岭南臬司、江右藩司、南鸿胪、南太常四印,又有太鸿胪、太常、少司寇诸图书”和“晤庄居士”所言之“印篆累累,朱墨灿然”印象吻合。而对姓名考辨来说,最为重要的当数多次出现的“西州遗民朱子”、“无易”、“无易氏”、“菊水”、“梅龙”、“繁川居士”等名章和署名,以及“眉山”、“成都”、“青城山”等四川地名。

由此,我们找到了与这些线索紧密相关、可证明是同一人的传记资料,发现他就是明末清初的四川成都人朱之臣(另有一朱之臣,为福建莆田人,非此

抄本手批作者)^①。《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载:“朱之臣,四川成都府仪卫司,明万历32年第三甲进士第八名。”^②陈田《明诗纪事》载:“朱之臣,字无易,仪卫司籍,成都人。万历甲辰进士,授大理评事。迁户部主事,历员外、郎中,出为德安府知府。历湖广副使、井陘道参政,迁江西布政使。有《梅龙集》。”^③记载了朱之臣中进士后的授官和历官,可补抄本万历四十七年前仕宦记录之不足。卓尔堪《明遗民诗》载:“朱之臣,字无易,号菊水,成都人。万历中进士。官江西右布政使,中蜚语,陷诏狱,烈皇帝释之。累官至南京兵部左侍郎。国变,居金陵,不见宾客,年九十卒。谭元春出其门,故诗多人竟陵派。著有《梅龙集》。”^④则提供了朱之臣崇祯间陷诏狱、最后的累官和卒岁,以及诗风与竟陵派领袖谭元春的关系。

《明季南略》则提到了朱之臣在甲申之变后的官职升迁情况,可与抄本最后一次题跋的记载对照:崇祯十七年(1644)四月戊午朔,在以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等人为首所发布的“誓告天地,号召天下臣民起义勤王,捐赈急事”的“南都公檄”中,有“鸿胪寺卿朱之臣”;在五月十三日庚子的“诸臣升迁推用”中,有“朱之臣太常卿”;八月十七日壬申,朱之臣任刑部侍郎;弘光元年(1645)三月初九壬辰,“朱之臣添注兵部左侍郎”^⑤。《清史稿·赵之龙传》则提到了弘光元年五月与忻城伯赵之龙等人一起归降清王朝的文武大臣中,即有时任礼部尚书的钱谦益和任兵部侍郎的朱之臣等人^⑥,则朱之臣后曾降清。大概朱之臣降清后并不曾仕清,与“生于明而拒仕于清的”的“明遗民”^⑦概念仍可关联,故卓尔堪仍视其为明遗民。至于此抄本“储王合集”书名下所注的“明宗室遗民手批”七字,当是据其题跋和印章而定,但其实朱之臣晚年曾降清,这是“尚论古人”所不得不指出的。

关于朱之臣的生年,则可据抄本最后一次题跋所署落款“西州遗民八十五

①据《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明代有两朱之臣,一为此抄本的手批作者,一为福建莆田人,明万历四十一年第二甲进士第九名。复据《明人室名别称字号索引》,后者字良献,号贞度,与前者字无易、菊水不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86页。而清陈作霖《明代金陵人物志》则将此二人的字号、籍贯和科第混淆了,称:“朱之臣,字无易,一字菊水,莆田人,万历癸丑进士。官江西右布政使。以蜚语下诏狱,旋释之。累至南兵部左侍郎。因家金陵,谢绝宾客,年九十余卒。”《明代传记丛刊》本,(台北)明文书局,1991年,150册,第293页。

②朱保炯、谢沛霖编:《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63年,第776页。

③陈田:《明诗纪事》庚签卷二一《朱之臣》,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2612页。

④卓尔堪:《明遗民诗》,中华书局,1961年,第381页。

⑤计六奇:《明季南略》,任道斌、魏得良点校,中华书局,1984年,第2、15、91、170页。

⑥赵尔巽等:《清史稿·赵之龙传》,中华书局,1977年,第9665页。《钦定八旗通志》卷一二六《多铎传》亦有同样记载,《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⑦卓尔堪:《明遗民诗》,第381页。

翁书于白下西园隐居。岁己亥，日中元”，知其生于明万历三年乙亥（1575）。再据“出其门”的谭元春《甲戌九月三日为朱师菊先生生辰八月十五日授匡庐僧往粤东文》^①，可知其生于九月三日。至于其卒年，则据《明遗民诗》“年九十卒”或其他文献的“年九十馀卒”^②记载，知其卒于清康熙三年甲辰（1664）或之后。

二、朱之臣手书评跋的竟陵派特色

朱之臣在《储王合集》抄本中所留下的大量朱墨笔圈点和手书眉批、夹批、尾批以及前后十一次题跋，构成了一个格式完备、手法纯熟的诗歌评点体系，这在明代诗歌评点学上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它虽然不是人们所熟知的诗歌选本评点和版刻形式，而只是私人阅读批注的诗集抄本，但他的文本校勘、作者指认、风格辨析，却可以成为明代诗歌评点学中的重要范本。更为重要的是，他的评点趣味和诗派观点，完全是竟陵派的，具有与钟惺、谭元春所编选的《唐诗归》桴鼓相应的精神品格，是竟陵派唐诗学的又一重要标志。它体现出“主观主义鉴赏批评的鲜明性格，在中国评点学史上体现出崭新的划时代意义”，“在晚明那种尊重自我、张扬个性的时代风潮下”，“他们以一种真正的诗人鉴赏活动，将前此评点著作较多专注于言‘法式’的批评立场彻底转换到直取作者之‘文心’，即所谓的‘求古人之真诗’，强调以深心玄览察其‘幽情单绪’的细读工夫与领悟力，把握诗人及作品的内在精神脉理，重建文本的深层意义。与之相适应，他们在前人的影响下更为整饬地建构了一整套借径开悟、意在言外的言说方式以及定型的评点格式，在推进传统之印象式批评发展的同时，彰显了其特异的批评个性。”^③而且，朱之臣还以九十岁的高龄从明末活到了清康熙年间，其所经历的鼎革之变和兴亡之感，时时流露于评跋文字中，从而使得其评点在具有独特个人性的同时，又具有复杂的时代性和丰富的人文精神感怀。这是一部沉埋了350年的重要诗歌手批评点之作（其他多是版刻之作），之前少有人知，其珍罕的竟陵派评点价值值得揭示。

经统计，朱之臣除以圈点标抹等符号式的传统评点形式施于所抄储、王诗之外，其他以文字批注的评点形式施于页眉、行间和诗尾者，王昌龄诗有121首，占全诗172首的70%；储光羲诗有114首，约占全诗230首的50%。王诗的评点共219条：就一首诗言，评点条数最多的是《宿灞上寄侍御玙弟》，有8条，1条眉批（总批），7条夹批；就一条评点字数最多言，是《送薛大赴安陆》，其行间手批有56字，云：“本迁客离忧，颜色不堪，自插入‘楚地’二字便幻。今

①《谭元春集》卷二四，陈杏珍标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651页。

②《四川通志》卷一四五引《蜀人物志》说朱之臣“年九十馀乃终”，《中国西南文献丛书》本，兰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7页。《明代金陵人物志》也说他“年九十馀卒”。

③陈广宏：《竟陵派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72-373页。

人不解此法,乃云少伯集脱讹殊甚,不足与言诗矣。即余再三寻绎乃知,固知读古人诗之难也。”储诗的评点共 256 条:一首诗评点条数最多的是《射雉词》、《至岳寺即大通大照禅塔上温上人》、《昭圣观》、《同诸公登慈恩寺塔》、《蔷薇篇》等诗,皆 5 条;一条中评点字数最多的是《升天行贻卢六健》和《同王维偶然作十首》其三,皆 52 字;组诗是储光羲诗的一大特点,朱之臣对此颇加留心,常常首首皆评,如《述华清宫五首》、《杂咏五首》、《游茅山五首》、《同王维偶然作十首》、《田家杂兴八首》、《秦中初霁献给事二首》、《朝邑蔡主簿期不会二首》、《长安道二首》、《江南曲二首》等组诗,尤其是《游茅山五首》有 10 条,《同王维偶然作十首》有 14 条,《田家杂兴八首》有 15 条。这些都体现了朱之臣评点的深入细致和全面。

从诗学追求和评点趣味言,朱之臣手批则表现出了非常鲜明的竟陵派特征。与钟惺、谭元春一样,他极力排斥后七子派一味追求高声壮语的创作方法和唯时代格调论的评论趣味,而推崇灵心慧性,追求幽朴隐秀、深静远韵的审美风格和审美理想。比如他在王昌龄《从军行七首》题下墨笔批云:“诸诗在龙标为创调,在后人为滥套,正非作者之罪也。”又朱笔眉批云:“龙标《从军》、《出塞》诸作,不过音节响快,其实无甚深味,而俗人多喜之。李于鳞至守定此一格,首首拟之,殊可厌也。”在王昌龄《秋山寄陈谏言》题下亦墨笔批云:“字句俱陈,以龙标手尚可厌如此,后人猥云拟古,如何看得?”直接点名批判后七子派领袖李攀龙,明确反对没有新意的“拟古”方法和“滥套”表现。另外,钟、谭在表露其诗歌审美理想时,常用“真”、“朴”、“深”、“厚”以及由它们衍生的一系列术语,以及与之相关联的“静”、“幽”、“和”、“细”、“新”、“奇”、“灵”、“秀”、“高”、“古”、“浑”、“老”、“活”、“润”、“直”、“奥”、“孤”、“拙”、“简”、“洁”、“微”、“婉”、“整”、“完”等风格、价值标准^①。对此,朱之臣在含意大抵相同的情况下,几乎全部使用了这些术语。比如他评储光羲《题太玄观》云:“真古,真朴,真高,真简。”评《山中贻崔六琪华》“恍惚登高岭,徘徊看落日”句云:“‘登高岭’上用‘恍惚’二字,与下句‘徘徊看落日’,非游华山青柯坪、峨眉雷洞坪、武当南崖宫,不知其真。”评《述华清宫五首》其一云:“直质苍朴,是储公本色语。”评《升天行贻卢六健》结句云:“结得幽澹。”评《游茅山五首》其二云:“每用平平语,却藏极深、极厚。此唐人至处,一学则浅矣。”评《游茅山五首》其五结句云:“落句怨矣。以‘乐’字覆之,何等深秀。”评《同张侍御鼎和京兆萧兵曹岁晚南园》云:“此君喜撰淡语、幽语。他人热闹处方之,则不必读储诗矣。”评《田家杂兴八首》其五“贫士养性情,不复知忧乐”句云:“人生忧乐便是性情。今于‘养性情’下着‘不复知’三字,何等渊永!”评王昌龄《客广陵》云:“又朴又润,又远又近。”评《赵十四兄见访》之章法云:“独承张翰作结,更不照管赵十四见访,此法老甚,微甚。使今人为

^①陈广宏:《竟陵派研究》,第 402-413 页。

之,不知添多少拖沓也。”只是相对而言,朱之臣少提“厚”字,更为重视“幽”字,并将其提升到与“真”、“朴”相等的最高审美理想高度;另外,也重视王昌龄诗中“格”、“韵”、“健拔”、“响俊”等传统的风格价值标准。

体现到诗歌评论上,朱之臣就十分强调从主体的个人情性和特征出发,去讨论古人在字法、句法和章法结构上的深心用意,以及真情实景、可以验证的审美效应。由此,他又和钟、谭一致,极为重视虚字的运用,淡语、幽语、浅语和情语、景语等的安排,儒、释、道三家语汇和本真情怀的表现,以及起句、结句的结构审美效果,而反对不从性灵出发,去一味应制倡和的装饰铺排作风。于是,朱之臣所评点的储、王诗,在总体上就具有了与钟、谭一致的诗歌特色和诗史定位,被置于与王维、孟浩然并列的盛唐山水田园诗派视野下,而与陶渊明所建构的田园诗学传统紧密联系。这一定位对储光羲来说,如果是理该如此的话,那么对今人常置于盛唐边塞诗派的王昌龄来说,则无论如何是一种独特诗派趣味下深入阅读的结果。

朱之臣的第一次题跋,即彰显了他对储、王二人的风格和诗史定位。他说:“王昌龄诗,格高而韵胜,其胜处在幽。储光羲诗,境淡而情深,其深处在朴。二公高处非王、孟所能及,直与陶靖节争衡于毫厘间耳。”其如此轩轾储、王与王、孟,实在有一反诗史成见、标举自我深心研究而拈出的幽朴特色之用意。然而这个说法与钟惺其实如出一辙。钟惺在《唐诗归》中对储、王二人诗即有一总评:“人知王、孟出于陶,不知细读储光羲及王昌龄诗深厚处,益见陶诗渊源脉络。盖学陶者,宁从二公入,莫从王、孟入。”又说:“储与王以厚掩其清,然所不足者非清;常建诗以清掩其厚,然所不足者非厚。”^①即十分显豁地敞露了其要开辟诗歌新思路和新世界的良苦用心,抛弃七子派“极肤极狭极熟”的套子和公安派“险且僻者”“俚者”的泥淖^②,超越其上,出以孤迥深心,标举竟陵诗派的幽朴灵秀。所以钟惺要一反“常规”,希望学陶者宁从储、王入,而不从王、孟入。盖前者于晚明学者还是新路,后者则早已在七子派时期即为通途,不容易张扬个性,也容易淹没个性。

仔细比较分析朱之臣在抄本和钟惺、谭元春在《唐诗归》中关于储光羲、王昌龄诗歌的评语,即可发现朱之臣是有意识地使用已经大成气候的竟陵派诗学评点术语,而努力推进拓宽关于储王诗的认识框架和认识水准。为便于集中说明问题,此处以王昌龄诗评点为例。

如《听弹〈风入松〉》阅赠杨补阙开篇云:“商风入我弦,夜竹深有露。”对此,谭评后句云:“‘深’字属竹,不属夜,奥妙。”朱之臣则评前句云:“弦字上

①钟惺、谭元春:《唐诗归》卷十一《王昌龄》,辽宁省图书馆藏明刻本,《续修四库全书》1589册。

②钟惺:《隐秀轩集》卷十六《诗归序》,李先耕、崔重庆标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235-237页。

加一我字,作何解?奇妙在此。”都分析王诗的思理和用语,有对待和补充作用。对“声意去复还”句,钟云:“五字奥甚。”朱则云:“声意二字妙,然出鲍明远诗。”又似是有意作对,指出在同样的“奥”“妙”思理指认上,又提出要注意其所延承的鲍照诗语问题。并补充评点其下句“九变待一顾”云:“知音之感。”再如《缙氏尉沈兴宗置酒南溪留赠》,钟、谭的评语较多,有夹批五条、尾批一条,朱则只有夹批和眉批二条。然朱氏夹评“春泉滴空崖”所云的“佳境”,实是对应着钟氏夹评“山樽在渔舟”所云的“佳事”。而其眉批所指出的用字之妙,则是针对钟、谭所未评的首句“林色与溪古,深篁引幽翠”,并将其与上引前一首《听弹》诗句连评云:“‘弦悲与林寂’,‘林色与溪古’,皆善用‘与’字。”指出王昌龄善用“与”字。如此似乎还嫌不够,朱之臣又在评储光羲《昭圣观》“新松引天籁”句时说:“‘引’字佳,王龙标剧善用‘引’字。”其中所指即有本处的“深篁引幽翠”。再如《出郴山口至叠石湾野人室中寄张十一》一诗,钟、谭十分欣赏,计有总批一条、夹批六条、尾批一条,朱氏也十分喜好,计有题批一条、行批二条、眉批二条。且看朱之臣的处理。针对钟、谭未批的题目,之臣云:“妙题,似谢康乐笔意。”针对未批的“景开独沿曳,响答随兴酬”二句,云:“孤甚,严甚。”针对未批的“野人善竹器,童子能溪讴”云:“着些闲言语更妙。”而“石脉尽横亘,潜潭何时流。既见万古色,颇尽一物由”四句,已有钟批前二句云:“不必读下二语,此五字亦有万古之感矣。”批后二句云:“透悟。”谭批后二句云:“子书中创获之语。”对此,朱之臣再以朱笔眉批云:“‘潜潭何时流’,问得荒唐;‘万古’二句,解得感慨。”进一步指出王昌龄写作这四句时的神情态度。而其另一条墨笔眉批,则是评该诗后半部分的叙事笔法,其言:“叙得来往幻杳,笔端警绝。”而这又是在谭氏已有的尾批“终之以摇摆澹宕,妙哉”基础上,进一步推展出来的。

三、朱之臣与钟惺、谭元春交游考

之所以朱之臣手批显出如此强的呼应《唐诗归》的效果,一是据谭元春的说法,朱之臣本人的取法是“诗过黄初”^①,诗歌“风格瘦”^②,与钟、谭相近,二是朱之臣与钟、谭尤其是谭有深入密切的交往。基于后者,当代有学者称朱之臣为竟陵派的“同志”^③。事实上,古人也是如此定位的。《四川通志》所引《蜀人物志》说他:“以风雅自任,识钟、谭于早岁,遂成一代词宗。”《明遗民诗》也说他:“谭元春出其门,故诗多人竟陵派。”而最能形象地显示朱之臣与钟惺、谭元春的密切关系者,是明末书坊在刊行《水经注》时,将三人列为合作评阅

①《谭元春集》卷七《无易先生下访寒河谈至月出始去》:“诗过黄初诵数章,自将行止发幽香。”《诗慰》评本句曰:“似朱先生。”第256页。

②《谭元春集》卷十六《寄朱公》:“西林诗卷风格瘦,题名佛手待苔旧。”第468页。

③邹国平:《“竟陵派”同志录》,上海社科院文研所编《中华文学史料》(一),百家出版社,1990年。

人^①，以达到招揽读者的目的。可见在“射利”的出版商眼里，这三人具有竟陵派的品牌效应。

由于朱之臣《梅龙集》现已不存^②，此处集中从钟惺、谭元春文集来看其与钟、谭的交往。现存今人整理的钟惺《隐秀轩集》中与朱之臣相关的诗和书信各一篇：诗为《赠别朱无易郡侯计事毕暂还成都并答前见赠之作》^③，题中所言“郡侯”，当指朱之臣万历四十三年所出任的湖广德安知府，方志载其“初抵任，即为文告神，誓不妄取一文。好奖掖名士。因构如水堂，以延问字者”。^④这些名士中当以钟、谭最为有名。书信为《与井陘道朱无易兵备》，其中有言：“记明公五月书中有云，不肖以《诗归》招尤。”^⑤则谈到了钟惺以《诗归》招祸的问题。这个朱之臣的“五月书”，据抄本第二、三次题跋所说的“明旦且之鹿泉任”和“鹿泉署中”，可知时间当在万历四十八年，朱之臣任北直隶布政司参政、分守井陘道兵备。由上可知钟、朱二人交情甚笃，而且朱之臣非常了解钟、谭所编选的《诗归》。《诗归》的开始编选，据谭元春说，是在“万历甲寅（四十二年，1614）、乙卯（四十三年，1615）间”^⑥。而编选的完成和正式刊行，有学者根据钟、谭序分别作于万历四十五年（1617）的八月一日和十一月五日，主张就在本年的秋冬间，并且说《诗归》在刊行的第二年，即万历四十六年（1618）“已产生了相当广泛的影响”，其所举出的两个证据中，即有上述钟惺与朱之臣的通信^⑦。确实，朱之臣自万历四十三年出任湖广德安知府始，至万历四十七年九月五日前解任湖广按察司屯盐道副使终，一直在湖北地区任职，自然对《诗归》的编选和刊行风波是了如指掌的，所以也才能在他批点《储王合集》抄本时体现出对《诗归》的强烈呼应。

至于谭元春为朱之臣写作的诗文，以今人整理的《谭元春集》计，即有29题、41首之多，可见朱之臣在谭元春心目中的地位之高和两人的交往之勤。其中《繁川庄记》和《繁川庄为无易咏》六绝句，乃谭氏为朱之臣在湖北的别墅而作，可证实抄本第一次题跋的“繁川居士”署名。朱之臣比钟惺小一岁，但登第为进士比钟惺早六年，比谭元春大十一岁，于谭氏为前辈。谭元春终身奉之为老师，把他视为与钟惺、蔡复一同样重要的师友人物。谭氏自言：“蓑士见其师菊先生曰

①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记载明崇祯间刻本《水经注》四十卷十二册的评阅姓氏，即有“竟陵钟惺伯敬甫、成都朱之臣无易甫、竟陵谭元春友夏甫”等人。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209页。

②仅卓尔堪《明遗民诗》卷十录其《司空楼》古诗、《沙罗坪饭》律诗，《明诗纪事》庚签卷二一录其《晓行》、《漫兴》两首绝句，计四首而已。

③钟惺：《隐秀轩集》卷三，第25页。

④《湖广通志》卷四十四《名宦志·德安府·明·朱之臣》，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⑤钟惺：《隐秀轩集》卷二八，第485页。

⑥《谭元春集》卷二五《退谷先生墓志铭》，第681页。

⑦陈广宏：《竟陵派研究》，第237、247页。

……春少夫子十有一岁,事夫子二十年,别去亦十六年,今相见于京师,苍颜改旧,下拜痛深,盖其感也。吾尝师事子蔡子,闽人也,年五十;又尝友子钟子,里人也,年才逾五十。年齿之重于师友也,可胜言哉!”^①朱之臣在湖北的为官时间长达五年,在此期间,他曾招钟、谭同游何氏旧园^②。而谭氏也经常出入其门下,诗酒宴会,唱和情深,与“最好予诗”的朱之臣次子履(字仲素)等家人都甚为相得^③。

朱之臣对谭元春也特别情厚,可说极尽揄扬奖掖之能事,让后者终身感怀不已。列其重要表现,有三:第一,对谭元春的举人考试十分关心,对其多次落选十分惋惜,抚慰之余,还当众为其坎坷命运叹息,并打抱不平:“有诗必见和,公出更独撰。有文必见药,对之常发叹。果于乙卯岁,失落青桐爨。公时不得报,露立衣常换。及乎戊午岁,公俱临贡院。草鞋束健毫,低头不敢盼。指示二三公,此生何时旦!”^④第二,降尊纡贵,亲自到谭元春住处寒河相访。这让谭氏十分激动,有迫不及待之感:“晴午临河红就湿,凉霄候月白争霜。”由此,《诗慰》评价谭元春写给朱之臣的交情诗云:“与朱公诗,每极推敲,所谓为悦己者容也。”^⑤并且,朱之臣还招谭氏兄弟到自己的江夏住处读书,非常照顾。第三,慷慨解囊,刻行谭元春诗集《退寻草》^⑥和《寒河集》,并作序向诗坛表扬。特别是朱之臣约作于万历四十四年的《寒河诗序》,即非常鲜明地体现了竟陵派的诗学特色、诗歌理想和流派定位,与蔡复一的《寒河集序》一起,成为宣扬竟陵派崛起的重要诗学文献。它明确显现出了要推倒以李攀龙为代表的后七子派、超越以袁宏道为代表的公安派的诗派雄心,标举“诗道最为情韵”的性灵为诗精神、“别具英变,以转未坠之线”的诗派胆识和“至性远情,其为诗清微静笃,一以传古人之深意,而生之以变”的诗派写作特色^⑦,呼应了钟、谭在《诗归》和一系列序言中所声言的作诗新路。

由上可以理解朱之臣在为储光羲、王昌龄诗作评点时,会多次有意无意地去呼应钟惺、谭元春《唐诗归》的诗学意见和诗派趣味,从而使得这部手书评点本成为竟陵派诗学的另一面重要旗帜。只是之前学界尚因其深藏图书馆故纸堆中,还不能确认这一事实罢了。

【作者简介】冯小禄,男,云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研究方向:辞赋和明清文学文献。

张欢,女,云南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研究方向:文艺学和中国古代文学。

①《谭元春集》卷二四《甲戌九月三日为朱师菊先生生辰八月十五日授匡庐僧往粤东文》,第652页。

②《谭元春集》卷五《无易先生招同伯敬游何氏旧园》,第173页。

③《谭元春集》卷五《寄送朱仲素朱先生次郎也最好予诗》,第174页。

④《谭元春集》卷三《己未岁呈无易先生》,第78页。另参卷十九《得无易先生枫香驿见题名录感予被落诗八韵增之七韵兼呈李师》,第514页。

⑤《谭元春集》卷七《无易先生下访寒河谈至月出始去》,第256页。

⑥《谭元春集》卷三《南岳归得无易先生书兼篆刻退寻诗于都门》,第66页。

⑦朱之臣:《寒河诗序》,见《谭元春集》附录一,第942页。

